

討論《西遊記》的翻譯問題。¹²他指出：書中有許多詩歌，文辭是幾乎不能翻譯的，例如：「驂騮騏驎，駉駉織離，龍媒紫燕，挾翼驪驎。」只能譯成：

Hua-lius and Ch'i-chis,
Lu-êrhs and Hsien-lis,
Consorts of Dragons and Purple Swallows,
Folded Wings and Su-hsiangs.

與原文的意味和辭趣，相差很遠了，難怪余教授對自己的翻譯也不感滿意，但亦別無他途！又如：「正是那當倒洞當當倒洞，洞當當倒洞當山。」他的譯文是：

Thus it is that Due-to Fall Cave duly faces the Due-to Fall Cave;
The cave duly facing the Due-to Fall Cave duly faces the mount.

完全失掉原文運辭用字之妙。

話雖如此，我把余教授所譯的《西遊記》看過一遍，覺得他的譯文已能表達原意什之八九。詳細批評，恕待異日。

英國牛津大學霍克思 (David Hawkes) 教授，潛心十年，致力於《紅樓夢》翻譯，¹³而今美國芝加哥大學余國藩教授，埋首八載(?)，鑽志於《西遊記》翻譯；兩位學者，隔岸相望，各展才華，確是當今譯壇的盛事了。

何 沛 雄

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Hall of Harmonious Wind. By Liu Ts'un-yan.

(E.J. Brill, Leiden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Faculty of Asian Studies,
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, 1976.)

《和風堂論文選》，收錄了柳存仁教授歷年來(至1972止)用英文在外國學報發表的重要著作，還加上一兩篇從未發表過的文章。全書共分四部，厚達四百五十多頁。為使讀者略知其內容起見，茲將四部論文要點，簡括譯述於后：

第一篇論文——《先唐時代祇教和摩尼教的活動探索》，獨立自成一部，主要是推

¹² 見 Anthony C. Yu, "On Translating the *Hsi-yu chi*", *The Art and Profession of Translation* (published by the 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Asia Foundation), Hong Kong, 1975, pp. 78-86.

¹³ 霍克思所譯的《紅樓夢》，採用《石頭記》*The Story of the Stone* 一名，現已出版第二冊。余嘗為其第一冊寫書評，載香港中文大學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》第八卷第一期(1976)，頁三七六至三八〇。

翻陳垣之說，認為祆教傳入中國當在六世紀之前，非如陳氏所說在公元五一六至五二七年之間，同時祆教對當時的社會風氣，產生了若干程度的影響。作者首先指出，嚴東注《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》時，對祆教已有認識，而嚴東在五世紀時在世，可知祆教在六世紀前已傳入中國。此外，作者又引《魏書》、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、《北齊書》、《隋書》等的記載，證明南北朝時代的君王、貴族，已有奉行祆教的，而《南史·齊本紀》永明十一年（493）載，時人膜拜「聖火」，更顯示當時祆教經已開始流傳。

過去不少學者，如沙畹、伯希和、陳垣、牟潤孫等，都認為摩尼教在公元六九四年傳入中國，但作者根據道教文獻和正史的記載，推斷摩尼教當在該年之前傳入中土。最值得注意的，是我國傳統以白色為不祥，但隋煬帝則常穿白衣，而《隋書·煬帝紀》云：「〔大業〕六年春正月癸亥朔，旦，有盜數十人，皆素冠練衣，焚香持華，自稱彌勒佛，入自建國門，監門者皆稽首。」這些強盜，正月吉日，竟然穿上白衣，而監門者又向他們稽首。照情形看來，他們可能是摩尼教徒，同時摩尼教的傳授很可能得到當局的默許，甚至獲得隋煬帝的贊助。從種種證明，可知祆教和摩尼教在先唐時代已在中國流行了。

乙部論文，都是與道教研究有關的。首篇論文——《十二世紀道士對肺癆病的認識》，指出在十二世紀中葉，中國道士對肺癆病已有認識，更討論它的治療方法，這比世界各國醫學專家早出數百年之久。從十五世紀到十九世紀，西方醫師，都有從事肺癆病的研究，惟直至公元一八六五年，韋利民(Jean Antonine Villemin)(1827—1892)，才確實證明肺癆是一種傳染病，其病菌可由患者傳染給別人或其他動物，但《道藏》103《無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》第三十卷二十三章有一篇文章，名叫《斷除尸瘵品》，它的序言，紀錄為公元一一二六年。這篇文章，謂傳染病能夠使人化成屍骸，此乃起自體內「九蟲」作祟。道士以為，肺癆病除得自傳染以外，亦由人體內特種寄生蟲（或病菌）所致，這種蟲（或病菌）埋伏在人體的穴道，當普通藥物失效時，則必須用針灸治療。唐高宗時，崔知悌嘗在洛州治癒肺癆病者十三人，著有《骨蒸病灸方》；北宋仁宗時，王衮（f. 1041）所編的《博濟方》，即有「癆蟲」一詞。又據李約瑟（Joseph Needham）的考證，十世紀中葉，中國道士已懂得使用凹凸鏡。由此可以證明，中國人對肺癆病的認識，較西方醫學界早數百年了。

次篇論文——《道教對明代理學家的深遠影響》，闡述明代士大夫深受道教的影響。作者根據明史及各種資料的記載，指出：（一）明代帝王奉信道士，尤以太祖、成祖、世宗為然；（二）明代拜祖宗、祭天地、祀山川等典禮，都有道教色彩；（三）明代宮廷樂曲，雜有道教音樂；（四）道士備受君王禮待，插手政壇，而「青詞」的撰作，竟引起朝臣權力鬭爭；（五）明代士大夫階級，深信道家法術，如選擇陵墓，則勘查地脈；行軍用兵，則觀天察氣（道家所說的「氣」）；（六）明代理學家的著述，雜有道家言論，如王陽明、王畿、羅汝芳等大家，也不例外。

第三篇論文——《三教貫一大師：林兆恩》，點出林兆恩是第一位正式提出「三教歸一」的倡導者。林氏生平，略見於黃宗羲的《南雷文案》，稱為《林三教傳》。他的思想，先受羅洪先，再受卓晚春的影響。羅洪先雖屬儒家，但深研《楞嚴經》，又通曉道學；卓晚春即上陽子，是一位道士。公元一五五六年，林兆恩開始宣傳他的「道」。他所說的「道」，是以釋、道注入儒學，提倡三教合一，並主張佛徒道士可以還俗結婚。林氏門徒，較著的有袁宗道、蕭雲舉、王圖、吳應賓等。他死後，時人為他立祀廟的不少，除多建於福建外，散佈於徽州、衢州、松江、南京等地。以他的生平事蹟寫成小說的，有《三教開迷歸正演義》。明亡後，「三教寺」仍然存在，但一七四四年，乾隆下詔禁建「三教寺」，這反映三教合一之說，曾經流行一時。

第四、五篇論文，分別敘述陸西星的生平和討論他的《參同契測疏》。陸西星雖有才華，但屢試不第，中年以後，遂棄儒從道。明代道教分為「全真教」和「正一教」兩派，陸西星大抵屬於前派。他著有《方壺外史》，論述道家的修煉方法，所說的「金丹」，含有「內丹」、「外丹」底雙重意義。又著《南華經副墨》，闡釋莊子哲理。最值得注意的，是他自認為儒者，但聲言不作「局儒」。先是明代三教合一之說流行，陸氏晚年更研究佛理，因而認為三教本非各自獨立，根源實歸於一云云。柳教授在文中考證，陸西星是《封神演義》的作者，又藉着陸西星的《參同契測疏》、《三教真詮》和其他材料，分析明代的混沌思想與玄秘崇尚。

第六篇論文，敘述袁黃的生平和他的《四諭》（《立命篇》）。作者指出，袁黃的思想與王陽明的學說很有關係。他一生的最大特點，是誓言要做數千次善行。他的《立命篇》強調善有善報的道理，而他的《功過格》也是勸善改過的，對當時學子產生了一些影響。

第三部份，包括論文、書評各兩篇。作者在《吳承恩的生平和事蹟》一文中，意欲推翻前人之說，以為吳氏的生年，不在一五〇〇或一五〇五或一五一〇或一五一一，而在一五〇六；同時又考證吳氏任長興縣丞時應為一五六四年，非如劉修業所說在一五五三年。又吳承恩卒於何年，學者頗有爭辯，多以為吳氏卒於一五八二年，但柳教授推斷為一五八三年。作者既討論吳承恩的文學成就，又從《西遊記》的原文，證明吳氏是該書的作者，認為吳承恩受了戲曲和傳奇的影響寫成這本小說。該書雖以高僧取佛經為故事題材，但辭彙則多雜道家語，大抵吳承恩也是主張三教合一的。文末附有「吳承恩詩文集人名錄」及「吳承恩事蹟編年」。

《民國以前中國小說的社會、道德觀念的規範》一文，指出中國古代小說（ancient Chinese fiction）與現代小說的明顯分別，是在用字選辭的不同：前者注重典雅，後者趨向通俗。作者援引例證，說明一九一九年以前的中國小說底寫作形式，受到佛教的影響，而小說的題材、主旨，離不了儒家禮教的樊籬，故事的結構、內容，也和當時的社會背景有密切關係。

兩篇書評，一則推許夏志清《中國古典小說評介》（*The Classical Chinese Novel; A Critical Introduction*）的優點，一則揭露布錫克（Jaroslav Průšek）《中國歷史文學論集》（*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: Collection Studies*）的錯誤。前者給予讀者對中國六部古典小說（《三國志演義》、《水滸傳》、《西遊記》、《金瓶梅》、《儒林外史》、《紅樓夢》）上佳的評析；後者舛誤百出，有待匡謬之處凡四十點云。

第四部份，《澳洲的漢學研究》和《研究中國文學家的歷史材料》，都是概論之作。首篇是作者出任澳洲國立大學中文系主任的就職演辭，強調學習一種語文，必須持之以恆，不可躐等求功。講辭簡述中國語文的特點、討論讀音的問題。作者贊同牛津大學霍克斯（Danid Hawkes）教授的意見，認為有了文言的基礎，學習語體文較易，反之則較難，但歐、美、澳洲大學的四年制中文課程，由於時間所制，則應致力於現代中文學習為宜，研究院則作別論。

次篇講論查考中國文學家時代、生平的方法和要籍，涉及正史、文集（包括總集、選集、別集）、年譜、圖錄各類，更介紹叢書和類書的功用。作者特別指出查考資料時應注意的地方，如查閱正史，必須留意有些文學家不入個人列傳，而入儒林傳、道學傳、文學傳、文藝傳、隱逸傳等。此外，今日研究中國文學，外文資料也不應忽略。

最後一篇《墨經一則》，是闡釋《墨經》「同異交得，……放有無。」的涵義。這不僅是釋義問題，還牽涉到句讀和英譯的問題。經過一番討論，作者提供以下的英文翻譯：

Things of contrary nature are interdependent. The case is exemplified in 'to have' and 'to have not'.

柳存仁教授的中英文著作很多，本書所選錄的十多篇論文，都是他的得意傑作。其中最令人稱道的，是《先唐時代祆教和摩尼教的活動探索》和《吳承恩的生平和事蹟》兩篇文章，詳徵博引，考證嚴實，辯正了前人的立論，開創了嶄新的見解，值得我們細心閱讀。

要確定祆教和摩尼教何時傳入中國是不可能的（除非另有新資料發現），因為外來宗教傳入中國之初，往往與儒、道混合。漢代佛教傳入中國，既與道教相混，而祆教、摩尼教傳入中國，又與佛道相混；三教歸一，更趨複雜，故道教文獻中，有若干詞彙，源自祆教或摩尼教，而新儒學家（Neo-Confucianist）又攝取佛、道哲理，闢創己見。時代懸邈，尋根索源，概不可得，現柳存仁教授以剝繭抽絲、爬蘿剔抉方法，從歷史記載與有關文獻，證明祆教傳入中國當在六世紀之前，而摩尼教大抵在隋朝時代已傳入中國。他的論斷，對研究我國宗教歷史，很有貢獻。

雖然多數學者認為吳承恩是《西遊記》的作者，但仍有爭論的餘地。柳教授從《西遊記》原文找尋證據，確定吳氏是該書的作者。此外，更列舉七項證明，指出吳承恩寫

《西遊記》深受元曲 (Yüan drama) 的影響。這些都是發前人之所未發的。文末的附錄，也是精心之作。「吳承恩詩文集人名錄」，依英文字母次序排列，共計八十一人，若其人里貫、官職和參考資料可以考查的，皆一一注明。「吳承恩事蹟編年」，對了解他的生平，很有幫助。篇首所列舉的書目，對吳承恩和他的著述研究，提供了寶貴的參考資料。

歷來研究道教文獻的人很少，而柳教授卻是這方面的專家。他曾經把《道藏》(共一千一百二十卷)終卷讀畢，筆錄節記五十冊，既摭取了很多重要資料，還開拓了研究道教歷史的新領域。例如《十二世紀道士對肺癆病的認識》、《陸西星和他的參同契測疏》，都是道前人之所未道的。明代以理學著稱，一般視作儒家道統，與孔孟學說一脈相承，讀完了作者的《道教對明代理學家的深遠影響》，自會徹悟，王陽明、王畿、羅汝芳等大家，也挹取道教理論，而當時君王士大夫莫不深受道教的影響。作者另有《明儒與道教》一文(原載《新亞學報》第八卷第一期，現收入《和風堂讀書記》上冊，頁二三三至二七一。)，讀者可一併參考。

作者於十餘年前嘗推究前人治《墨經》的得失，著《墨經箋疑》上下兩篇(載《新亞學報》第六卷第一期及第七卷一期，現收入《和風堂讀書記》頁一至二三一)，論者咸推精審。本書的《墨經一則》，特別把經文「同異交得，放有無。」的涵義，詳細闡釋，並將經、說譯為英文，評論前人譯文的得失。近年倫敦大學葛克咸(A.C. Graham)教授也致力於《墨子》研究，完成《後期墨家的邏輯、倫理與科學觀》一書，現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，讀者亦可參考。

法國漢學大師戴密微(P. Demiéville)教授在本書的序言(Preface)裏說：本書雖然未能盡量收錄柳教授的佳作，但已能使讀者認識一位當今傑出漢學家多方面的研究成果，他發揚了中國文化的光輝，也豐富了世界文化的寶藏。我以為這並不是溢美之辭。

由於本書的論文，大部份從各學報的原文翻印而成，因而排版格式、字體大小，都不齊一；同時有些篇章，加插中文，有些則完全省略，而其中一篇的中文字拼音，跟其他各篇不相同。這些都是編印技術上的小小瑕疵而已。

何 沛 雄